

阐释的记忆与技艺

——《文心雕龙》在美国汉学界的“中国性”与“世界性”问题

谷鹏飞

内容提要 《文心雕龙》在 20 世纪美国汉学界的传播与研究,不宜简单理解为汉学研究的比堪发微,而应理解为比较研究的阐释学问题。美国的《文心雕龙》比较研究,以 20 世纪中叶以来渐成世界文学批评中心的美国整体文学语境为阐释空间,以阐释的记忆与技艺为研究方法,既回返中国文学批评历史语境凸显《文心雕龙》的“中国性”身份,又移置美国文学批评当代空间而拓展《文心雕龙》的“世界性”价值,从而成为 20 世纪海外《文心雕龙》研究最有建树的成果。

关键词 美国汉学;《文心雕龙》;阐释学研究;身份认同

众所周知,《文心雕龙》于 20 世纪中叶以来在美国汉学界的翻译传播,构成了海外“龙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于这种内容,学术界已经从翻译批评、后殖民主义、汉学与中国学等角度作出重要研究。本文拟从比较研究阐释学的角度,将《文心雕龙》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理解为中国文学理论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并在世界文学理论空间中获享“世界性”经典身份的重要步骤。基于此视角,本文讨论的问题指向一种阐释学的视域融合与重叠认同,它在具体的发展中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逻辑问题:其一,美国汉学界如何对《文心雕龙》文本进行阐释学意义上的互视与互释,以肯认其区别于世界文学批评的“中国性”身份?其二,美国汉学界如何阐释《文心雕龙》文本在当代的“世界性”价值,并将这种“世界性”价值读进世界文学批评的内在脉络?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对作为世界主流文学批评话语的美国文学批评,与尚处于世界文学批评边缘的《文心雕龙》之关系,进行阐释学意义上的三重“反写”,既强调主流话语对边缘话语走向中心的贡献,又重视边缘话语对主流话语的积极认同与借鉴,还认可边缘话语与主流话语由于意义阐释与共识重叠而搭建全新“世界性”话语的可能。

一 《文心雕龙》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阐释空间

与任何文本一样,《文心雕龙》所荣享的“中国性”经典身份,其有效性源于特定的阐释空间,一俟源文本移入新的阐释空间,其凝结的阐释经验便难以再上升为层叠性的共识观念。要认定《文心雕龙》文本在进入美国文学批评后的身份,必须首先重建源文本与新阐释空间的符契关系。

美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后逐渐成为国际汉学的研究中心,美国文学研究在四五十年代后逐渐强化“世界文学”的价值身份,美国文学批评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对阐释学的格外倚重^[1],都为《文心雕龙》在美国重建自我身份提供了新的阐释契机。

美国汉学在其 20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由“早期汉学”到 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的转变,而转变的结果,是美国汉学从传统的以语文学和文献考证为特色的“汉学”基础研究,逐渐让位于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研究与实用研究,亦即“中国学”或“中国研究”^[2]。所以,《文心雕龙》于其时在美国的接受研究,虽然在研究属性上可归于“汉学”基础研

究,但在研究价值取向与研究范式上却呈现出强烈的“中国学”或“中国研究”色彩。

美国在进入20世纪后,由新批评、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多种文学与文化思潮合力铸就的,并非一种“美国中心”的观念狂想;它通过引借异质文学与文化来抵御和摧毁那些所有被英法等欧洲文学中心钦定为“经典”的文本形式、文学修辞与作品意义,为树立差异、断裂、多元、解构的文学观念——后者作为分歧、缺位、无意义向来在西方经典文学批评中缄默无语——铺平道路,以此谋求自身的经典与中心地位。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出现的众多带有解构色彩的文学现象与文学批评,其首要目的在于对欧洲文学作为“世界文学”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对“美国文学”作为新的“世界文学”中心地位的肯认,虽然这种肯认并没有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却在理论上催生了一种阐释学后果:文学与文学批评“经典”实为阐释学的建构;任何跨文化语境中文学与文学批评“经典”地位的获得,都需要阐释学意义上的积化为橘,这样,“美国”文学与文学批评作为新的世界文学与文学批评“经典”地位的获得,必须援引美国文学与文学批评之外的“非经典”才有可能。

在这样一种观念意识下,《文心雕龙》作为边缘文学文本于50年代正式进入美国文学批评空间,实际也是美国文学通过“非我”的交流肯诺,建构异域空间的“经典”自我,获得象征性的“经典”身份表达的结果。设若我们回到美国文学现场,就会看到,美国文学于其时格外热衷于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诉求,希望美国文学能够提供一种超越单一民族属性的多民族、多种族文学立场,要求“美国文学经典所选择的作品是要代表整个文化的”^[3],而非在美国“国家”意义上发展“美国文学”。因此,我们对于美国《文心雕龙》的阐释研究,不能简单理解为主流文学对边缘文学的恣意欺凌,也不能理解为“东方主义”的文学征服,而应理解为美国在跨文化文学交流中通过异质文化资源的征引来建构自我的基本策略。也正是这个背景,才为《文心雕龙》在美国的比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阐释学空间——尽管其时已渐成气候的美国式“东方学”研究,并未放弃对印度、中国、埃及等异域“他者”

的“中心主义”立场,相反一直作为想象的“中心”而存在,但它却在事实上为《文心雕龙》在美国的传播研究提供了便利的阐释空间,因为美国“东方学”方法论的“讲究逻辑、讲究实证、讲究系统”逻辑,在理论上要求对那些同样具有西方文化属性但一直背负“落后”名声的东方文学文本的重视^[4],而《文心雕龙》的“体系性”写作在中国“诗文评”的批评传统中原属“另类”,但是,一俟其进入美国文学空间,却因其兼有“落后”身份与类似于西方文学批评的“体系性”双重特色而成为备受推崇的对象。

此外,《文心雕龙》在70年代后能够持续受到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关注,亦是美国文学批评建构“世界文学批评”的需要,其“整个文学研究企图让批评的中心回到批评本身以及塑造它的背景、条件和关系上”^[5]。重视文学研究的背景与历史,而非对文本作单纯的“新批评”,成为其时美国文学批评的一股洪流。这一方法论的转型使得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那些具备深厚历史与文化背景,具有多样的政治与道德关切,却由于诸多原因而被排挤出西方主流文学批评文本之外的边缘文学批评文本重新受到关注,后者与美国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一道汇集而成多声部文本叙事洪流,通过引入“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的互文性阐释,助力美国文学批评在“新批评”之后的再度“向外转”。

从世界文学批评空间来看,50年代后,世界文学批评的中心已渐由欧洲移往美国,但其时的美国文学批评还只是国族文学批评,并非“世界”文学批评,并未配享“世界”文学批评经典身份。为了成为世界文学批评中心的“多数”文论^[6],就必须扩充文学资源,积累更多的文学资本,强化其作为世界文学批评空间的“中心”地位,吸纳部分尚处于世界文学批评空间边缘,但具有“文学创新”价值的“少数”文学批评。“文学创新”是相较于已经获得世界文学批评经典身份的“多数”文学批评而言的,对于那些已经处于世界文学批评中心的英语、法语文学批评而言,东方文学批评,特别是中国、印度与日本文学批评,在其进入文学现代性之前,都具有“陌生”或“创新”的价值。而

《文心雕龙》作为曾经的民族文学批评经典所具有的“陌生”或“创新”价值，正好成为美国文学批评引为奥援以此建构“世界”批评经典身份的重要资源。当然，从后见之明来看，50年代后包括《文心雕龙》在内的众多中国文学批评文本由于海外传播而生发的对自身身份的文学现代性想象，也在事实上助力了美国文学批评的“世界性”身份建构。正是通过将具有“创新”价值的中国文学批评文本与美国文学批评进行互文阐释，美国文学批评才与中国文学批评一道，共同分享了关于“世界文学”的基本观念，由此跻身“世界文学批评”行列并获得卡萨诺瓦意义上的文学“祝圣”。

二 阐释的记忆：美国文学批评想象空间中《文心雕龙》的“中国性”问题

与美国文学批评“世界性”身份建构相伴的，从60年代起，人们将美国文学批评置于阐释学的基础上，将文学文本的理解置于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强调回到文本发生现场，而非视文学批评为单纯的“去西方中心”方法工具^[7]。受此影响，以文学批评为主业的美国汉学家们，也在研究取向上转而强调汉学文本的历史语境与文学现场，凸显在汉学研究中，“什么是我们不可遗忘的”（扬·阿斯曼语）问题的重要性。对于这些汉学家而言，为了寻回那“不可遗忘的”东西，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要要求汉学研究对文本的历史现场作想象性的回忆，以确保那“不可遗忘的”东西在文本阐释中的意义。对于《文心雕龙》文本而言，汉学家们需要做的，就是重新回忆《文心雕龙》文本的历史与文化语境，重置《文心雕龙》作者的想象空间，清理隐蔽于历史尘埃中的源文本身份，让《文心雕龙》曾经的“中国性”身份自然显露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汉学家首先通过对《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所处文学空间的阐释记忆，重置刘勰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经典”身份地位。华裔学者赖明（Lai Ming）在《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将刘勰置入中国文学批评的片段性场景中，通过与刘勰同时期另一位批评家钟嵘及齐梁之际中国文学风格

的比较，暗示刘勰并非是一位迎合时代文学取向的批评家。在赖明看来，当时代性的文学潮流已然指向华词丽句的形式主义美学诉求时，刘勰却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对于文学作品具有双重重要性，单一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无疑将有害于文学”；“当其时中国文坛的一小撮人秉持文学天才对于文学多样化的风格具有决定意义的文学观念时，刘勰却率先指出，天才尽管重要，但作者生长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对其成长与建树亦具有根本性影响”^[8]。在赖明看来，刘勰的这些文学主张显然为其经典身份提供了佐证：“刘勰是第一位强调文学批评应有专业素养的人，他坚持认为批评家惟有秉持客观的态度，才能对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其中，文学风格、文学修辞、作品原创性、作品立场、文学内容、文学基调等，均可以作为文学评判的标准。”^[9]这样，赖明就通过对刘勰所处文学空间的阐释记忆，彰显了刘勰不流俗于其时的经典作家身份，凭此身份，刘勰便可与千余年后持有文学经典立场的阐释者形成一个阐释共同体；而有了这个共同体，即使作者隐没于原有的文本空间，阐释者也能够通过阐释共同体的记忆来廓清作者原赋的经典身份。

无独有偶，李又安（Adele Austin Rickett）也通过将刘勰还原至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空间来肯定其“中国性”的经典身份。在李又安看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文学创作的突出强调，实际上是中国文学批评注重创作的一贯传统。“诗人是如何创造的、诗歌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等“文学的创作”问题，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重大主题^[10]。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李氏首先肯定了刘勰内在于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事实，但与赖明不同的是，他同时又对刘勰的“中国文学批评家”身份做了分疏处理，指出：“中国的一流批评家，从刘勰始，就一直流露出对其所处时代文学的不满。他们认为，这些作品词藻华丽、风格轻浮、无病呻吟，乏有文学创造天赋而只泥于对其他文学流派的单一模仿。秉持儒家信条的批评家哀于此种衰落，要求文学返回对‘道’与‘真理’的追求，而后者只能通过对圣贤的学习来实现；秉持佛教信条的批评家，则呼吁作家回归到对往昔诗人的遵从之途，

因为过往诗人已经用简洁的文辞表达了自己对自然真理的颖悟,从而可以使读者通过这些文辞领会自然的本质。”^[11]李氏的言外之意,刘勰是同时兼有“儒”“佛”双重文学属性的经典“中国文学批评家”,因而必然内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复杂传统。

其次,汉学界通过语境还原与互文论证,重建《文心雕龙》的“中国性”文学身份。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汉学界的《文心雕龙》研究格外强调通过对原文本作语境还原的方式,建构与西方主流文学批评的互文关系,以此凸显《文心雕龙》文本的“中国性”文学批评身份。

1962年,在由哈佛大学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编辑出版的“哈佛燕京研究丛刊”第三卷《中国文学的主题:梗概与基本典籍》之第六章“六世纪的文学批评观念”中,作者就通过语境还原的方法,指认《文心雕龙》的“中国性”文学批评经典身份。在海氏看来,要正确评判《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地位,就应该将其置于整个六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脉络中,因为在一种“要么质疑、要么再释、要么重建经典文学标准”的时代性文学观念中,《文心雕龙》主要表现了对经典文学标准“全面、彻底、深刻、有效的捍卫”^[12]。这种捍卫既是对沈约所定下的经典文学观念的承继,同时也与其后继者钟嵘构成了紧张的文学观念革新关系。显然,正是通过语境还原的方法,海氏指认了《文心雕龙》的“中国性”批评身份,而这种指认,又为包括叶扬(Yang Ye)等在内的后来一大批汉学家所袭用。在《中国诗歌的结尾》一文中,加州大学的叶扬使用语境还原与中西文学观念互文论证的方法,将《文心雕龙》视为一部中国最早的系统性文学批评专著,从诗歌结构与结构批评的角度,论证了《文心雕龙》“章句”“附会”等重要的文学创作观念范畴,说明这些观念范畴对于中国文学创作中“起、承、转、合”的写作结构以及“部分与整体”关系等重要文学创作问题所起到的根本性影响作用^[13]。叶杨正是以肯认“体系性”之于西方文学批评重要性的方式,互文了《文心雕龙》“体系性”文体特色及其所表达“体系性”的文学创作观念之重要性,论证了《文心雕龙》文本的经典性,其基本

研究价值可以用后来的汉学家、任教于康奈尔大学的阮思德(Bruce Rusk)的结论性话语来概括,即“《文心雕龙》构成了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重要典范”^[14]。

如果说海陶玮、叶扬等人对《文心雕龙》的研究还多拘泥于体系与框架的身份指认,还未深入到对文本内在义理与关键概念的梳理,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种略显粗疏的研究范式已被一种更为细致的文本解读与比较阐释所取代。

1976年,著名汉学家费威廉(William Craig Fisk)向威斯康辛麦迪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国中古时期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中的经典主题:模仿、互文性、形象性与前景化》更加翔实地对《文心雕龙》的义理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传统的关系做出阐释。在费威廉看来,“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任一问题,均需置于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相关语境中才能理解”^[15],“阐释中国诗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其还原至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固有语境”,“设若我们要建构一种普遍性的文学理论,就势必要将中国文学理论与作为理论反映的中国诗歌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16]。因为后者“可以提供一种对比性的方法,凭此方法,文学理论或可另觅佳枝,而非严格限定在现代欧洲的理论根基上”^[17]。费氏通过将《文心雕龙》与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范畴史的互文论证,突出了《文心雕龙》在宋之前对中国文学批评诸多重要问题的影响,指证其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典范意义。

语境还原与互文论证的阐释,最终目的是形成一种关于文学文本、文学批评文本与文学时代社会语境的共同体意识。有了这样一种共同体意识,《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典范的“中国性”身份,才能在历史流传物的多重阐释中保持清晰的身份记忆。而为了铭刻这种记忆,又常需要对《文心雕龙》原文本细节进行比堪还原与阐释记忆。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所做的工作,正体现了这一优长。在《传统中国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兆》一书中,宇文氏将《文心雕龙》中的“文”字还原到中国文学的话语体系中,运用比较阐释的方法,讨论了中国文学之“文”与西方文学之“文”在源头与本质上的区别,认为二者一为基于对宇宙自我的表现

创造，一为对自然世界的再现模仿；前者决定了它在审美属性上享有高出其他造型艺术的历史地位，后者则恰好相反^[18]。宇氏通过对“文”范畴的比堪阐释，意在揭示刘勰之“文”在中国文学话语体系中的经典性，从而印证刘勰论“文”的“中国性”概念身份。

另一位美籍华裔汉学家、曾任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主席（ACLS）、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的余宝琳（Pauline Yu），在1987年出版了《中国诗歌传统的意象阅读》一书。在该书中，余氏将刘勰讨论的“隐秀”“比兴”“夸饰”“辨骚”等文学创作及文体问题，还原至中国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意象”概念史传统，一方面用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意象”统摄《文心雕龙》诸概念，另一方面又以“意象”为原点，将“意象”概念与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接续起来，实现以“意象”为原点对《文心雕龙》经典诗学传统的重建。在余氏看来，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6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皆对“意象”问题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并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文学与中国诗学的“意象”传统。除了重建中国文学批评中的“意象”传统外，余氏还将《文心雕龙》中的“意象”问题与西方文学中的“意象”（Image）——后者主要是对经典文学“模仿”传统所作的反拨——进行比堪互释，以此重拾《文心雕龙》“意象”话语的“中国性”身份记忆。^[19]

上述诸位汉学家通过对《文心雕龙》“中国性”文学批评身份的阐释记忆，印证了一条基本的阐释学原理：在阐释活动中，阐释总会唤起情境记忆并赋予文本以经典意义，文本就在每一次的意义赋予中回到自身。通过阐释记忆，阐释者不仅揭示了尘封于文本中的时间过往，而且赋予文本以现时的空间眼光，使文本在“冷”记忆（扬·阿斯曼）中获得了省思自我的力量。

三 阐释的技艺：美国文学批评现实空间中《文心雕龙》的“世界性”问题

如果说《文心雕龙》在美国阐释记忆中的“中

国性”身份建构，是通过身份还原的“冷”记忆，将作者与流传文本还原至源语文化的想象空间中，扯去尘封于文本上的层层历史迷障来彰显流传文本的“中国性”身份的话；那么，其“世界性”身份建构，则是通过“热”的技艺，亦即将《文心雕龙》置于美国当代的现实文学批评空间中，通过抹平阐释者与源文本的时空间距，实现源文本与美国文学批评的互文阐释，从而开启《文心雕龙》的“世界性”身份。

美国华盛顿大学的吉布斯（Donald Arthur Gibbs）在完成于1970年的博士论文《〈文心雕龙〉中的文学理论》中，从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要素入手，全面阐扬了《文心雕龙》的“世界性”身份。具体来说，他从文体阐释学的角度，根据《文心雕龙》表述内容的不同，亦即是强调主体内在情感的表达，还是外在文学规范的树立，将《文心雕龙》区别为“规定性的”与“描述性的”两大不同内容，认为《文心雕龙》从第1章“原道”到第25章“书记”，主要讨论文学规范的确立，此为“规定性的”内容，类似于美国当代文学批评意义上的文学本体论、文学文体论；而从26章至第50章，即从“神思”篇至“序志”篇，主要讨论主体内在情感的表达，加上尾章自传部分，此为“描述性的”内容，这部分内容类似于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创作论与批评论^[20]。为了强化对《文心雕龙》“中国性”与“世界性”身份的认同，吉氏还提醒我们要认识到《文心雕龙》“对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贡献”^[21]，应注意刘勰“不应被视为主流文学之外的他者，而应视为一名世界文学学者”^[22]。吉布斯正是通过对《文心雕龙》文本身份与作者身份的复义阐释，才实现了对《文心雕龙》文本“世界性”身份的重叠认同。

吉布斯对《文心雕龙》文本的“世界性”身份阐释，实际上是运用“文本接触”的阐释技艺，对不同文化空间中的文本进行文化挪用，以重新协商源语文学文本的经典性。他在博士论文的末尾，不厌其烦地从文学文本、文学批评文本、作家身份三个方面，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所代表的“世界性”身份做出重叠认同：第一，《文心雕龙》作为文学文本，因其秉有“创造性的文学美”本身而配

享“世界文学”身份；第二，《文心雕龙》中提出的文学基本观念，特别是它提出“通变”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史观，为人们正确对待过往的文学经典树立了一个堪称“世界性”的文学与文学批评观念标准；第三，刘勰本人因其杰出贡献而成为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作家之一，理应享有“世界性”文学作家身份。^[23]这样，吉布斯就最终通过对文本身份、批评身份与作家身份的重叠阐释，完成了《文心雕龙》“世界性”经典身份的重构，这种重构方式影响了此后美国汉学研究的基本取向，成为美国主流汉学界最为经典的阐释技艺。

但文本阐释的“技艺”并不止于文本语义的跨文化重叠互释，它同时要求对文本进行精神现象学的观察，将文本的意义理解视为文本后继者的辩证阐释运动，阐释的技艺因而更多地表现为阐释的辩证法；经由阐释的辩证法，文本的初始语境意义才拓展为新的空间意义。

华裔学者刘若愚（James J.Y. Liu）在《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就运用阐释的辩证法，在美国文学理论的现实空间中重构《文心雕龙》的“世界性”身份。作为一本本科生使用的教科书，该书使用的文本阐释技艺是：（1）用西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阐释学解读《文心雕龙》，将《文心雕龙》各篇归摄于以“原道”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文学本体。（2）将艾布拉姆斯的艺术理论“四分法”——模仿的、实用的、表现的、客观的，拓展为“六分法”——“形而上学的”“决定型的”“表现型的”“技巧型的”“审美型的”和“实用型的”，并以“六分法”为框架，将《文心雕龙》厘定为中国“形而上学型的”的文学理论发展臻于完善阶段的代表^[24]。通过如上两个步骤的阐释，《文心雕龙》就既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同时更在世界文学批评空间中获享代表性身份，成为具有普适性的世界文学批评典范。

从阐释学的角度看，刘若愚将《文心雕龙》作为流传文本在美国文学批评空间中的阐释，是一种既携带阐释者特定“前见”，又遵从精神现象学一般逻辑的辩证阐释。当阐释者意识到自身正处于一种不同于源文本的文化空间，或源文本已经经历了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变迁时，为了理解流传文

本，就必须斩断源文本与源语文化的意义关联，使文本意义的革新成为必然。正是由于刘若愚等人所开启的这种比较文学研究阐释学二难，不惟华裔学者，后来海外众多汉学家也都站在美国当代文学批评空间中，通过引入阐释学的解经技艺，对《文心雕龙》进行“世界性”的身份重构。

比如，斯坦福大学邵耀成（Paul Yang-shing Shao）在1981年的博士论文《刘勰：理论家、批评家、修辞学家》中，就以《文心雕龙》中的基本文学观念为切入点，通过对流行于其时的美国主流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援引（如援引保罗·利科的符号学方法释读《文心雕龙》的修辞理论，援引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理论凸显刘勰的创作论，援引韦勒克和沃伦的《文学理论》阐释《文心雕龙》的基本理论框架等）^[25]，来阐扬《文心雕龙》所具有的“世界性”文学理论品质。华盛顿大学的怀碧德（Peter B. Way）在1990年的博士论文《亚里斯多德〈诗学〉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古典主义》，也基于中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公共性问题，通过分析《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古典主义”共性，证明《文心雕龙》的“世界性”文学身份。^[26]宇文所安则在《刘勰与话语机器》一文中完全跳出6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想象空间，站在美国当代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与新批评的现实立场上，将《文心雕龙》视为一部有着自己结构与功能的“话语机器”。^[27]虽然他们所使用的精神现象学方法与文本阐释的辩证法，并非多数中国文学批评所专长，但却一直为西方文学批评所倚重。

长期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的蔡宗齐，也与上述学者一样，通过阐释的辩证法，站在世界性文学批评立场上，重构《文心雕龙》的“世界性”身份。在《比较诗学结构》一书中，蔡宗齐通过对刘勰与华兹华斯关于文学创造思想的互释比较，揭示中西方文学批评的共性与个性问题，认为西方文学批评是“基于真理的”二元宇宙论范式，而中国文学批评则是“基于过程的”非二元宇宙论范式。^[28]在蔡氏看来，对《文心雕龙》在美国的研究，必须克服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偏见，超越比较文学研究与汉学研究中常用的“内文化视角”与“跨文化视角”，而站在一种新的“超文化视角”，才能重新

发现《文心雕龙》的“世界性”价值，建立同中有异的“世界性”文学批评理论。^[29]

晚近的《文心雕龙》“世界性”身份研究，是由任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的华裔学者顾明栋（Gu Ming Dong）作出的。在《中国阅读及书写理论：走向阐释学与开放诗学之途》一书中，顾明栋超越地理与文化间距，将美国文学批评原本陌生的《文心雕龙》文本，并入美国文学批评的当下视阈里，通过择取《文心雕龙》中“言”“意”“象”理论，运用西方阐释学的辩证法与视阈融合结构，讨论建立一种跨文化的开放诗学的可能性，以此印证《文心雕龙》的“世界性”文学批评身份。^[30]

上述汉学家在美国文学批评的现实空间内对《文心雕龙》文本的辩证阐释表明，中国文学批评的经典性不一定镶嵌在民族国家的疆界内，它常有其异域空间中的飞地。当文本的阐释空间发生转捩，《文心雕龙》原本的身份意义也必然发生衍变。

四 阐释记忆与技艺的互文： 《文心雕龙》的“中国性” 与“世界性”身份

通过对《文心雕龙》在美国文学批评想象空间与现实空间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其一，文本阐释中的记忆常以语境回溯的形式出现，正是通过语境回溯，《文心雕龙》才崭露了其尘封的文本记忆；而与之对应的文本意义，也并不取决于过去，而是取决于将来，因为阐释者意欲如何开辟将来，他就会如何回溯过去，虽然经由阐释记忆而拾回的文本意义，可能并不就是原始的文本本义，而只是本义的延宕、层叠与分歧。其二，文本阐释的技艺，其意义也并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文本本义，而在于技艺行为本身产生多大的超文本意义。文本阐释的记忆与技艺，因而便成为一种互文共证的意义重叠关系：（1）历史文本由于历史积淀记忆而使文本获得空间性重现；（2）历史文本由于持存经验记忆而使文本获得时间性呈现；（3）当下文本由于时间性阐释技艺而使文本获得空间性理解；（4）当下文本由于空间性理解技艺而使文本成为指向未来的时间性形态。

上述文本阐释的记忆与技艺逻辑关系表明，文本意义的留存，需要基于文本记忆的阐释技艺。当过去文本的记忆不再能保留其原有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便会催生出新的记忆框架。正是这个记忆框架，为阐释的技艺提供了效果历史的辩证结构。藉此结构，原文本的意义创造才持续性地敞开。因此，当美籍汉学家在美国文学批评的空间内，袭用现代文学批评眼光，来阐扬《文心雕龙》的“世界性”身份时，就势必要将其抽离原有的文化与文学空间，移入现代性的世界文学空间，并用现代文学批评的阐释技艺，来判定其“世界性”的文学批评价值。而经由美籍汉学家阐释技艺而得的《文心雕龙》新文本，它在长久的阐释过程中因被美国文学批评所浸染，已然不是一种等同于原文本的佛教文本、骈文文本、儒家文学批评文本，而是一种变异文本。这种“变异”文本，既非比较研究的强制阐释结果，也非殖民主义的文本修辞策略，而是古老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所自然产生的阐释学后果。

这样看来，虽然目前华裔汉学家的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多为对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记忆阐释与民族文学特殊性价值的肯认阐扬，其主要目的还在于传葵曄之芬芳于域外，而比较文学所追求的那种超越民族文学特殊性之上的文学普世价值与世界宗教立场，^[31]还未构成他们的首要目标；但是，当另一部分美籍汉学家弥纶群言综合诸说，利用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研究框架与阐释技艺来对《文心雕龙》进行阐释，就不能简单理解为后殖民主义式的削足适履，也不能理解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制修辞策略，而应理解为本土文本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身份重估与经典重构的必要技艺，理解为中国文学经典在中西与古今当口重新走向世界的一种阐释学遭遇。因为正是在西方文学批评的“世界主义”普遍性理解框架中，《文心雕龙》的比较阐释才实现了“世界性”经典的等值兑换；正是在比较阐释的现代性知识生产技艺中，《文心雕龙》作为源语文化的民族性身份才暂时退场，而作为跨文化的世界文学批评知识性身份才会出场。

虽然目前我们还难以肯定《文心雕龙》在美国的文本阐释是否必然催生出汉学研究中的“冲击—回应”正反馈效果，抑或催生出文化研究意义上

的“影响—焦虑”逆反馈后果，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注意世界文学批评内部互动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注意适应文学现代性的潮流，在《文心雕龙》所处的“中国文学批评”与“世界文学批评”双向空间中，发掘其“中国性”与“世界性”双重价值。毕竟，阐释学意义上的《文心雕龙》比较研究，所能揭示的始终是一种语境化的文本生存。正是在语境化的观念生存里，《文心雕龙》文本才发现了自身的多重样态。而《文心雕龙》在比较阐释中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也正是行进在阐释学路途上的文本不同现身情态，而非两种文本存在。文本阐释的记忆与技艺，表面上是文本经典化的不同形式，实质上是民族文化认同理念变革的结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史料整理与翻译研究（1951—2010）”（批准号15BZW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3][5][6] 伯科维奇主编：《剑桥美国文学史》第8卷，杨仁敬等译，第154页、第287页、第315页，第312页，第314页，第37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2] 参见魏思齐：《美国汉学研究的概况》，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07年第26卷第2期；顾均：《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4]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第187—20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7] 理查德·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第287—288页，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8][9] Lai M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64, p.167, p.167.

[10][11] Adele Austin Rickett Edited, *Chinese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from Confucius to Liang Ch'i-ch'a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12, p.18.

[12] James Robert Hightower, *Topics in Chinese Literature: Outlines and Bibliographi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p.43.

[13] Yang Ye, *Chinese Poetic Closure, Asian Thought and Culture*, Vol.10, New York: Peter Lang Press, 1996, p.5.

[14] Bruce Rusk, *Critics and Commentators: the book of Poems as Classic and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46.

[15][16][17] William Craig Fisk, *Formal themes in medieval Chinese and moder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mimesis, intertextuality, figurativeness, and foregrounding*, Ph.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976, p.201, p.230, pp.211-212.

[18]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Wisc.: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18-21.

[19] Pauline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121.

[20][21][22][23] Gibbs, 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n-hsin Tiao-Lung*,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70, p.72, p.4, p.114, p.139.

[24] James J.Y. Liu, *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25] Shao, Paul Yang-shing, *Liu Hsieh as literary theorist, Critic and Rhetorici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h.D., 1981.

[26] Peter B.Way, *Classicism in Aristotle's Poetics and Liu Xie's Wenxin Diaolong*, Ph.D.,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90.

[27] 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田晓菲译，第98—11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8][29] 蔡宗齐：《比较诗学结构：中西文论研究的三种视角》，刘青海译，第98—101页，第239—25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0] Gu Ming Dong, *Chinese Theorie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A Route to Hermeneutics and Open Poe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5.

[31] Fañçois Jost,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4, pp.29-30.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吴子林